

刘严萍, 王世通, 曹玉龙, 等. 社区减灾文化传播障碍因素研究[J]. 灾害学, 2023, 38(1): 13–17, 24. [LIU Yanping, WANG Shitong, CAO Yulong, et al. Study on the Obstacle Factors of Community Disaster Reduction Culture Transmission[J]. Journal of Catastrophology, 2023, 38(1): 13–17, 24. doi: 10.3969/j.issn.1000-811X.2023.01.003.]

社区减灾文化传播障碍因素研究^{*}

刘严萍^{1,2}, 王世通¹, 曹玉龙¹, 侯光辉^{2,3}

(1. 天津城建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天津 300384; 2. 汕头大学 地方政府发展研究所, 广东 汕头 515063;
3. 汕头大学 法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63)

摘 要: 基于文献归纳和专家意见确定访谈提纲, 通过对社区居民开展半结构化访谈收集原始资料, 应用质性研究方法和 NVivo 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 经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和饱和度检验流程, 构建社区减灾文化传播障碍因素概念模型。研究揭示, 社区减灾文化传播障碍因素具体涵盖以下方面: 受众对减灾文化功能、价值取向、相关政策及减灾文化内涵的认知水平, 对减灾文化传播活动的关注度、风险态势演化特点、传播主体素质与行为选择、传播平台构建、参与途径设计、传播时机与力度选择、受众意愿与行为、传播内容设计与表现方式选择。基于此, 减灾文化传播需着力变革传播理念, 优化话语体系, 从传播主体、平台、内容、方式等方面系统改进现有工作。

关键词: 社区; 减灾文化; 传播; 障碍因素; 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 X43; X915.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11X(2023)01-0013-06

doi: 10.3969/j.issn.1000-811X.2023.01.003

尽管经过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但人们仍然容易受到灾害伤害, 文化为了解灾害所导致的地方影响和建立社区复原力提供了新视角^[1-4]。特定地点的社会脆弱性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规范的产物^[5], 在与灾难相关的政策和实践中, 文化往往被视为有形的、同质的、静态的, 社区的多样性被忽视了^[6]。减灾文化(culture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可以被视为是安全文化(safety culture)的一部分^[6], 是对人们在长期应对灾害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意识、价值理念、道德规范、行为习惯等的总称^[1,6-9]。相近概念有灾害文化(disaster subculture, disaster culture)和应急文化(emergency culture, culture of emergency preparedness education)。灾害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在与灾害共生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类型, 包含灾害认知、记忆、记录、传承, 与灾害有关的思想、心理、伦理、祭祀、信仰、禁忌、习俗、文学、艺术, 及应对措施、制度及社会影响等内容^[10-14]。了解应急文化对于改进公共政策和项目至关重要^[15-16], 应急文化影响人们的应急准备行为^[17-18], 广义上包括一切与应对灾害及各类突发事件相关的人类行为观念、态度、心理、活动等方式^[19]。应急文化源于灾害文化、减灾文化, 更多是在灾害社会学、灾害管理学层面加以研究^[20]。

因此, 灾难及其再现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 系统地关注灾难的文化层面是重要的工作^[15]。虽然人们着力解决备灾的经济和技术问题, 但在了解减少灾害风险的文化和社会障碍和机会方面的努力却很少^[17]。不论从研究内容还是从研究方法而言, 已有研究成果尚未形成体系, 导致减灾文化传播领域目前亟需系统化指导实际工作的理论依据。从研究内容而言, 大多数研究成果散落于以下方面: 社区与个人、生产与生活、常态与应急、运营与备用等状态下的安全文化教育及演练模式^[1]; 人的发展在减灾文化中的作用^[2]; 减灾文化传播促进建议^[5-8]; 文化在应急过程的作用^[6,9,11,12-15], 文化如何影响人们实施减灾措施的过程^[16-18]等。现有研究在以下方面尚缺乏典型研究成果: 减灾文化传播障碍因素; 减灾文化传播效果评价体系; 减灾文化传播时间空间差异等。从研究方法而言, 减灾文化研究应包含了量化分析、质性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的可能性^[13], 但是目前质性研究不足, 尤其是在探索减灾文化传播障碍因素方面的质性研究尚有一定空间。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遵循扎根理论研究路径, 以社区居民为访谈对象, 构建减灾文化传播障碍因素理论模型, 以期从受众视角系统揭示减灾文化传播瓶颈。

^{*} 收稿日期: 2022-05-20 修回日期: 2022-10-09

基金项目: 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汕头大学地方政府发展研究所开放基金课题(07422002-01);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2 年度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研究专项(GD22TW06-14); 汕头大学科研启动经费项目(STF19015)

第一作者简介: 刘严萍(1979-), 女, 汉族, 河南汝南人, 博士, 讲师, 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城市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

E-mail: liuxiawy@126.com

1 研究方法 with 数据收集

1.1 研究设计

扎根理论由 1967 年格拉斯和斯特劳斯提出。该研究方法在研究开始前未基于任何理论假定,研究者从原始资料中逐步归纳出概念和命题,然后上升至理论。减灾文化研究属于信息资源管理、传播学和行政管理等的交叉研究领域,目前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参考文献较少,从访谈中获取数据是进行定性分析最直接的途径之一。因此,本文通过半结构访谈法收集资料,基于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进而提炼减灾文化传播障碍因素理论模型。

1.2 访谈提纲编制

基于文献分析,根据访谈逻辑表编制初步访谈提纲;为确保受访者准确理解访谈目的,所获得访谈资料能充分反映研究内容,课题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对访谈提纲进行修改;对 3 位受访者进行访谈并调整访谈提纲后,展开正式访谈。正式访谈提纲包含受访者基本信息、参与经历、需求、态度与感受等内容。

1.3 数据收集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间,课题组采用

目的性抽样最大差异化策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下东海社区居民内确定访谈对象,随后开展半结构化访谈。经整理形成 2 万余字原始资料,受访者信息如表 1 所示。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以 F₁ 到 F₃₀ 指代。

2 减灾文化传播障碍因素分析及模型构建

运用扎根理论分析访谈资料,将 18 份访谈资料用于理论建模,另外 12 份访谈资料用于检验理论模型的饱和度。

2.1 开放式编码

运用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1 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遵循编码程序要求,开放式编码尽量贴近受访者原话,并去除出现频率 5 次以下的初始概念,对初始概念范畴化(表 2)。

2.2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是将开放式编码结果进行聚类整合,使所得范畴更具概念性、统筹性与代表性。以 pearson 系数 >0.6 为基本判别准则提取节点并建立逻辑内涵,形成含义内容更加宽泛的主范畴(表 3)。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项目	类型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17	56.7
	女	13	43.3
年龄	25 周岁及以下	12	40.0
	26 ~ 35 周岁	7	23.3
	36 ~ 45 周岁	6	20.0
	46 ~ 55 周岁	3	10.0
	56 ~ 65 周岁	2	6.7
	66 周岁以上	1	3.3
学历	初中及以下	7	23.3
	高中	5	16.7
	本科及以上	18	60.0

表 2 开放式编码情况

初始范畴	代表性原始材料语句
功能认知	A5: 减灾文化实用性强,有助于我们养成防灾减灾救灾的意识,规范突发事件发生时人们的应急响应行为。
	A7: 有助于在防灾减灾时约束不当行为,使得应急响应效率更高。
	A9: 可以让志愿者更加了解灾害的危害,更好地保护自己。如果志愿者能够更多了解减灾文化的话,能够提高和专业救援力量的协同能力。
价值认知	A1: 有助于让更多人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提高社会整体的应急素养。
	A17: 用减灾文化引导社会组织、公众的思想和行为,引导他们服务社会,提高人们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A13: 在我看来,减灾文化的发展旨在提升国家、社会的应急协同能力。
政策认知	A1: 前几年出台的《加强新时代防震减灾科普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培育减灾文化。
	A9: 不是很了解,因为平时不经常关注这方面信息。
内涵认知	A1: 减少灾害损失的文化。
	A2: 即未雨绸缪,在灾害到来之前做好应对准备。
主动关注	A5: 我会经常了解有关减灾文化的知识。
	A10: 肯定是要认真了解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减灾常识。
强度	A3: 突发事件的强度和种类影响减灾文化的发展。
叠加性	A12: 如果频率高,同时发生的突发事件类型较多,风险容易叠加,那么大家就更重视减灾文化传播。
发生频率	A1: 我觉得现在突发事件爆发的频率不高。
	A9: 还是挺频繁的,比如说食品安全事件、河南暴雨事件等。

续表 2

力度与时机选择	A2: 若发生频率低时减灾文化传播力度减小, 以前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A4: 爆发频率高, 人们会更加重视这些活动, 此时传播效果相对来说较好。
志愿服务	A6: 设置志愿者以宣传减灾防灾知识, 让人们了解防灾减灾常识。 A11: 如果有自己可以做的, 愿意尽己所能做志愿服务。
态度层面	A4: 我对于减灾文化传播活动抱有积极接纳态度。 A16: 目前很多人不重视减灾文化。
参与行为	A2: 就我个人而言, 我比较愿意参加。
传播意识	A6: 其实从我个人而言, 我认为我可以以志愿者身份, 通过设计海报、动漫作品等方式传播相关信息。
传播内容	A7: 主要看内容是不是很实用, 是否符合现实需求。 A9: 发布平台比较权威, 内容通常比较可信。
表现方式	A1: 是否多样化, 一般图文结合、直观的、贴近生活的、篇幅短的比较好。 A11: 以趣味性、体验性和互动性的展示方式较好。
宣传栏	A7: 一些社区的宣传栏宣传一些防灾减灾知识。 A12: 新的社区有电子大屏滚动播放火灾等防灾减灾动漫作品等。
讲座	A11: 我看到红会到一些社区对小学生进行科普讲座, 还有演练。 A13: 我接收过一些有关应急科普的讲座邀请。
网页	A8: 平时通过政府官网了解, 还有微博、电子报纸、抖音等。
APP	A3: 我一般接收到有关减灾和应急相关的内容, 都是通过新闻 APP 推送。
公众号	A10: 我接触到的一般是由固原大城小事公众号、固原中学公众号推送的。 A11: 在我们第一中学公众号里推广。
政府	A3: 我认为政府可以对减灾文化传播活动进行引导与规范。 A10: 政府组织起到带头作用, 指导相关机构进行相关活动的开展和学习。
社会组织	A1: 对政府无法触及到的地方他们可以查漏补缺, 完善各方面。 A5: 这些组织都是防灾减灾救灾的主力军, 缺一不可。
学校	A13: 高校也可以作为传播主体。 A16: 学校虽然不断传播减灾思想, 但好多人其实不重视。
公民个体	A3: 我们可以积极宣传相关知识, 比如到社区里面去宣传等。 A10: 我们在对外传播减灾文化的时候, 首先应做到自己了解。

表 3 主轴式编码情况

主范畴	副范畴	内涵
认知水平	功能认知	对引导、约束与激励功能的认知程度
	价值认知	对减灾文化促进全面发展的素质性取向、促进社会发展的服务性取向、促进和谐发展的共生性取向的认识深度
	内涵认知	对减灾文化内涵认识的全面性、准确度
	政策认知	对相关政策内容的掌握情况
关注意识	主动关注	对减灾文化传播信息的关注程度
风险态势	灾害种类	自己经历过的突发事件种类
	发生频率	一年内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次数
	叠加性	同时发生的突发事件之间是否出现了风险叠加
参与途径	志愿服务	参与减灾文化传播活动的渠道
意愿与行为	态度层面	对减灾文化活动态度积极主动与否
	参与行为	基于自身需求、意愿或目标, 产生借助平台获得相关信息, 并对其利用、反馈的行为
	传播意识	是否意识到自身也可以成长为传播主体之一, 对 ([相关信息进行二次传递
传播平台	宣传栏	分布在社区里的宣传窗
	视频	静态影像方式传播技术
	讲座	一种教学形式, 多用报告会、广播 ([方式进行
	网页	是承载各种网站应用的平台
	APP	智能手机的第三方应用程序
	公众号	开发者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申请的应用账号
传播方式	传播内容	相关信息是否为受众所关心、感兴趣, 是否重要、新鲜, 是否可靠、可信
	表现方式	涵盖传播主体的形象、权威性, 内容的结构、节奏、变化, 遣词造句的方法、语气、语调等
传播主体	政府	引导减灾文化信息的收集、加工、整理、传递、反馈、评价等 ([信息传播活动
	社会组织	辅助力量
	学校	老师讲解、学校相关活动
	公民个体	向家人、朋友传播

(2)信效度检验。本研究借助 NVivo11 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对照组独立编码分析,编码结果整体趋于一致,表明本研究信度较好。采用反馈法检验效度。将所得基本结论随机阐述给几位受访对象,寻找反馈意见并完善模型。此次,采用相关性检验,访谈对象的多元化保证一定程度上数据资料的完善和相互补充与验证。

3 结论与讨论

(1)9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每年参与1~2次政府、企业、学校组织的减灾文化传播活动,多为地震、消防和疫情防控演练。这表明目前政府、社会组织等传播主体在社区减灾文化传播过程中出力颇多,但活动的种类单一且传播力度不足。

(2)社区居民对于减灾文化传播的关注意识、接纳程度与当地和全社会范围内突发事件发生频率、危害程度等风险态势之间呈现关联性。约60%的受访者表示,突发事件发生频率越高,自己对于减灾文化传播活动的关注度会越高;其余受访者则表示突发事件的爆发与己无关,对于减灾文化并未做过多了解;约60%的受访者提及某类突发事件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增加时,人们对减灾文化传播活动关注度会攀升。

(3)约30%的受访者表示常通过APP、网页、公众号等平台了解突发事件应对知识和技能及相关政策;约5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并不清楚哪些部门发布过减灾文化相关政策,对于减灾文化略有涉猎,主要源于曾参加过的志愿服务或应急演练活动,但活动内容与方式比较单调,缺乏传播精准性和创新性。这表明部分受访者对减灾文化传播持有关注意识,但相关活动吸引力不够导致其参与意愿不够强烈。此外,部分受访者意识到自身既是减灾文化传播的对象,又是减灾文化传播主体之一。

综上所述,减灾文化传播需着力变革传播理念,优化话语体系,从传播主体、平台、内容、方式等方面系统改进现有工作。各地政府应立足本地实际情况,转变“推动式”传播理念,激发社会组织、大众传媒、公众等主体肩负传播减灾文化社会责任的文化自觉,鼓励多主体协同梳理受众需求,推进需求导向的“拉动式”传播理念。鼓励多主体参与减灾文化传播活动,完善相关领域的具体政策法规,合理引导和规范他们有序参与减灾文化传播活动。着力形成既能清晰概括减灾文化功能价值又富有传播力的新表述,着力形成符合本地社区居民审美旨趣的可接受的话语体系,提升减灾文化传播的亲力和实效性,塑造全社会减灾文化传播氛围、完善减灾文化传播平台网络、促进传播触角全方位延展。同时,政府、社会组织等传播主体应采用贴近不同群体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减灾文化分众化表达,使得不同群体的受众从各自最易理解的侧面来认知减灾文化。基于风险态势对受众接受减灾文化信息意愿的影响有明显的波动性特点,传播方应借助信息技术、社区信息员对受众所处的环境变化进行密切关注,

把握社区减灾文化传播的时机,适时调整社区减灾文化传播频率,推动减灾文化传播工作统筹推进与渐进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 金磊. 综合减灾教育八讲: 全民综合减灾文化教育读本[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0.
- [2] 何永年. 减灾文化杂谈[J]. 防灾博览, 2011(5): 30-37.
- [3] KULATUNGA U. Impact of culture towards disaster risk redu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Property Management, 2010, 14(4): 304-313.
- [4] ERIKSEN, CKRISTINE. Cultures and disasters: understanding cultural framings i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54(2): 226-227.
- [5] MARTINEZ G, COSTAS S, FERREIRA Ó. The role of culture for coastal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measur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northern and southern Europe[J]. Advances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2020, 11(4): 297-309.
- [6] MALDONADO J. Considering culture in disaster practice[J]. Annals of Anthropological Practice, 2016, 40(1): 52-60.
- [7] ANDRI N R MARDIAH, ROBERT B OLSHANSKY, MIZAN B F BISRI. Post-Disaster Governance in Southeast Asia[M]. Springer, Singapore, 2022.
- [8] 李永祥. 迈向以社区需求为导向的防灾减灾研究: 写在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J]. 云南社会科学, 2018(5): 1-9, 185.
- [9] 唐钧, 郑雯. 培育防灾减灾文化全面应对风险社会[J]. 中国减灾, 2012(9): 40-42.
- [10] 蓝煜昕, 张雪. 社区韧性及其实现路径: 基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J]. 行政管理改革, 2020(7): 73-82.
- [11] MERCER J, GAILLARD J C, CROWLEY K, et al. Culture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lessons and opportunities[J]. Environmental Hazards, 2012, 11(2): 74-95.
- [12] WARNER J, ENGEL K. Disaster culture matters[J]. Ambiente & Sociedade, 2014, 17(4): 1-8.
- [13] 王晓葵. 灾害文化的中日比较: 以地震灾害记忆空间构建为例[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45(6): 47-55.
- [14] WEBB G R, WACHTENDORF T, EYRE A. Bringing culture back in: Exploring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disast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2000, 18(1): 5-19.
- [15] CASTAÑEDA J V, BRONFMAN N C, CISTERNAS P C,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e of natural disaster preparedness: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experience and sociodemographic predictors[J]. Natural Hazards, 2020, 103(2): 1881-1904.
- [16] KAPUCU N, KHOSA S. Disaster resiliency and culture of preparedness for university and college campuses[J].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013, 45(1): 3-37.
- [17] AYE B - KARLSSON S, KNIVETON D, CANNON T, et al. I will not go, I cannot go: cultural and social limitations of disaster preparedness in Asia, Africa, and Oceania[J]. Disasters, 2019, 43(4): 752-770.
- [18] SAYUTI R H, INDERASARI O P, EVENDI A.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and local culture on community preparedness in facing disasters[J]. Jurnal Penelitian Dan Pengkajian Ilmu Pendidikan: e - Saintika, 2021, 5(1): 1-14.
- [19] 汪云, 迟菲, 陈安. 中外灾害应急文化差异分析[J]. 灾害学, 2016, 31(1): 226-234.
- [20] 颜辉. 应急文化内在构成、生成条件与作用机理研究[J]. 灾害学, 2021, 36(4): 156-162.

(下转第24页)

verifi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method in Specifications for Design of Highway Tunnel. Finally, the parameter analysis of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i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ve error of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between this method and the standard method is small, and the law is consistent. The pressure of the inner surrounding rock of the two tunnel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outer surrounding rock, that is, the stress of the middle rock is large, which verifie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alculation method in this paper. Increasing the horizontal support force is effective to reduce the pressure on the top of the tunnel and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the tunnel. The vertical average surrounding rock pressure i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clear distance, the two are roughly non-linearly correlated, and the increase amplitude is gradually reduced. Rock pressure is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arameters GSI, m_i and σ_{ci} in nonlinear Hoek – Brown criterion. Therefore, for weak surrounding rock, reinforcement can be carried out, and its mechanical properties can be improved, so that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surrounding rock is improved, and the surrounding rock pressure borne by the tunnel is reduced.

Keywords: deep buried tunnel; surrounding rock pressure; small clear distance; limit analysis

+++++

(上接第 17 页)

Study on the Obstacle Factors of Community Disaster Reduction Culture Transmission

LIU Yanping^{1,2}, WANG Shitong¹, CAO Yulong¹, HOU Guanghui^{2,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ianjin Chengjia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 China;

2. Local Government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515063, China;

3. Law School,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51506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view data and using the triple process of open coding, selective coding and theoretical coding of grounded theory method,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disaster reduction is fou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NVivo software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interview data, and a conceptual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disaster reducti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constructe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NVivo software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interview data.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barriers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disaster reduction culture in communities are as follows: Audience's cognitive level of cultural function, value orientation, related policies and connotation of disaster reduction, attention,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isk situation, quality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s and behavior selection,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platform, design of participation channels, choice of timing and intensity, audience's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design of communication content and choice of expression. Therefore, the communication of disaster reduction culture should focus on reforming the communication concept, optimiz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and systematically improving the existing work from the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 platform, content and method.

Keywords: community; culture of disaster reduction; transmission; obstacle factors; grounded theory